

一 段祺瑞生平事略

清末民初，段祺瑞算得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三造共和”，四起四落，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内阁总理和临时执政等职，文治武功，显赫一时，知名度仅次于孙中山和袁世凯。

近百年来，人们对段祺瑞毁誉不一。誉之者美其为“三造共和”的英雄，毁之者斥其为卖国独裁的民贼。笔者但秉笔直书其生平事略，是非曲直，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一）“牛”是怎样变成“虎”的？

清同治四年农历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周家圩一户段姓地主喜得贵子，父母给这个男孩起名启瑞，字芝泉。他就是后来“三造共和”、大名鼎鼎的段祺瑞。

按照中国古老的干支纪年法，这年是乙丑年。复按照中国古老的十二属相动物纪年法，这年称作“牛年”，故这年生的孩子，自然便属“牛”了。段家新添一“牛”，合家无不欢喜。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三十年后，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腥风血雨中，这头段家“牛”竟变成了一只北洋“虎”。

过去，中国人十分讲究“地望”。在他们看来，生在那些名人出生或生活过的地方是身份和声望的象征，可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名人效应。近代以来，合肥是北洋军鼻祖李鸿章的故乡，盛产淮军将领。生于合肥并拥有一个曾作过淮军将领的祖父，这自然使段祺瑞沾了“地望”的光。这对于尔后他号召天下，号令北洋，无疑发

挥了重大作用。

段家祖籍江西饶州（今波阳），明末先后迁居安徽英山、寿县、六安等县，最后定居合肥县（今合肥市）。段祺瑞祖父段珮原系佃农，靠租种本村周姓地主的土地谋生。清同治元年（1862年）春，他随少东家周盛波和周盛传弃农从军，跟着同乡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因“功”任淮军统领，驻防江苏宿迁。其子从文凭借余荫取得监生资格，儿媳范氏则被封为夫人。

这个名叫从文的男人和这个姓范的女人，便是段祺瑞的父母。他们生育了三子一女：祺瑞为长子；次子启辅，在家务农；三子启勋，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北洋军第二镇参谋、宪兵学堂总办和井陉煤矿总经理等职；女儿启英，排行为二，长嫁陈家，后因丈夫早故依兄长生活。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周家圩既然已成周家的天下，段家只好另谋发展。就在段祺瑞 6 岁那年，段从文携家迁居本县大姚岗。他修房造屋、买田置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史。本来，凭借父亲的权势和监生资格入监读书，他只须经过一次考试就可获得官职。但是，他却想做一名坐享其成的乡绅。由于他剥削有方，很快便拥有田地数百亩，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地主。

8 岁那年，段祺瑞离家赴祖父任所宿迁读私塾时，其“虎性”便初露端倪。他不喜欢死气沉沉的书斋和圣贤们“之乎者也”的教诲，更不喜欢塾师那道貌岸然、摇头晃脑的怪样子，却喜欢老虎那套扑、掀、剪的吃人技巧。于是，他常率领一帮顽童舞刀弄枪，分成两方进行战争游戏。他自封“大将军”，身挎木棒削成的马刀，神气活现地指挥“官兵”围剿“草寇”。每逢这时，塾师总是无可奈何地倒背双手，迈八字步一旁观战。某次，这位冬烘先生不由摇头叹气地说：“将门之后，自宜深通兵法。然不读圣贤之书，不过一介武夫而已！”塾师之意，无非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既会“吃人”，又会“骗人”的文武全才。可惜的是，他当时并未领会恩师

的良苦用心，依然我行我素。

数年后，祖父罢官携祺瑞返乡。不久，祖父与父亲相继去世，段家顿时中落。时至此日，祺瑞方知刻苦攻读，16岁考中文童。母亲想让他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他却执意要步祖父的后尘。第二年，他步行两千多里由皖赴鲁投奔堂叔段从德（管带），担任军中司书，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光绪十一年（1885年），段祺瑞已届弱冠之年。他觉得自己的爪牙还不够锋利，便决定出外磨练。段从德认为后生可畏，遂推荐他人天津武备学堂炮科第一期学习。该校系淮军首领李鸿章创办。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式武学堂，史称北洋武备学堂，学制四年，校址在天津水师公所，目的在为清政府“培植将材”。当年，该校共录生100多名，王士珍、曹锟、段芝贵等人也名列其中。后来，从这个学校毕业的还有冯国璋、陆建章、李纯、张怀芝、田中玉和雷震春等人。袁世凯创建北洋军时，网罗的“将材”主要就是这些人。故段这次磨练，对他尔后飞黄腾达创造了条件。

翌年春，段祺瑞奉母命返乡完婚。妻子是江苏宿迁吴氏，婚后生一子一女。子宏业，后成为段的得力助手；女淑贞，后嫁李鸿章孙李国垣。

李鸿章与段家为世交，故对段祺瑞关怀备至。段毕业后，被李选派留学德国，仍习炮科。

段祺瑞留学德国后，对西方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对列强的船坚炮利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很快便成为一位崇德派。然而，德国的一些人却瞧不起中国留学生，经常借机羞辱他们。段就碰上这么一件倒霉事，并气得他上演了一幕“怒而剪发”的喜剧。

某天，段祺瑞上街漫步，不料竟被一群德国人团团围住。大家对他脑后的“狗尾巴”（长辫子）指指点点，不时发出阵阵嘲笑。段羞愧而归大发雷霆，连鼻子都歪到了一边（这是段的一个生理特点，但凡盛怒，鼻子必歪，故人们背后称他“歪鼻子”）。他找出一

把剪刀就要剪发，一位同学见状大惊，连忙夺过剪刀劝阻：“君以官费留学他邦，不告朝廷自弃其辫，万一朝廷震怒，断君学费，恐求学不成，归国亦难。利害孰轻孰重，君试思之。”段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这话不无道理。人家嘲笑我的辫子，说明中国的“国粹”不好。虽然不好，但眼下还用得上。对，求新存旧方为两全其美之策。从此，段虽闭口不提剪发之事，但对德崇拜却与日俱增，以至到了有病非德国医生不请，非德国药不吃的地步。

光绪十八年（1892年）秋，段祺瑞学成归国，出任北洋军械局委员。不久，段奉命调任威海随营武备学堂教习。任教期间，他以执教严格、以身作则而小有名气。

两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段祺瑞奉命率领军校学生协守威海炮台。结果，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威海炮台等战略要地丧失殆尽，李鸿章丧权辱国一蹶不振，段亦因之丢官返乡闲居。从此，段似乎失去了青云直上的机会。

但是，未过多久，机会又来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督练新编陆军。翌年春，袁以段祺瑞系北洋武备学堂高材生且有知兵之名，招其速来军前效力。据沃邱仲子《段祺瑞》一书记载：段闻讯后，立即赶赴新建陆军营地，“面试程序，滔滔不竭，项城（指袁）大奇之”。于是，段步步高升，“未几，由教习迨擢炮队标统。每议军事，必谘询于君（指段），俟得其同意而后行，其见重于项城有如此者”。其实，袁之重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段的“虎性”。

自从上了北洋军阀这座山头后，段祺瑞很快以治军有方、办事干练获得袁世凯的宠信，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

据说，这“北洋三杰”的称号，还是一位洋教头恩施的呢！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的一天，在观看北洋军操练时，一位德国教官用马鞭遥指着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的背影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北洋袍泽又据三人相貌言

行特征,将他们形象化为“龙”、“虎”、“狗”。王长得骨秀神逸,说话半吞半吐,做事有头无尾,被喻为见首不见尾的“龙”。段长得虎头虎脑,遇事刚愎自用,且常爱发脾气,被喻为凶猛暴躁的“虎”。而冯虽长得肥头大耳,但办事却心思细巧,被喻为善解人意的“狗”。

从此,段祺瑞便在北洋军中崭露头角。

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后,袁世凯先后设立新建陆军行营武备学堂、北洋军官学堂和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等军事院校,借以培养北洋军中下级军官。各军校皆以段祺瑞为督办(校长),故各军校学生均以段为师。又因以上各校校址均在保定,故人称这些军校的毕业生为保定军官派。十多年间,这些军校先后培养了许多北洋将领,主要有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吴光新、贾德耀、卢永祥、张敬尧、吴佩孚和孙传芳等人。另外,蒋介石、傅作义和陈调元等人,也系段的入室弟子。

其时,段祺瑞正逢盛年,精神奕奕,对学生又十分爱护,故深受学生崇拜。每逢在校园或其它地方碰见段,学生们便不由肃然起敬,立正行礼。段对这些学生则点头答礼,勉励有加,颇有礼贤下士、谆谆善导的长者风度。

在此期间,段祺瑞还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继娶袁世凯的干女儿张佩衡为妻,成为袁的干女婿。张氏后生四女,并与段白头偕老。二是将妻弟吴光新、儿子段宏业和侄儿段宏纲送入军校,培养了一支家兵家将。

段祺瑞因办学成绩卓著,加之又与袁世凯攀上亲戚,故数年间便青云直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后,段先后担任中央练兵处军令司正使,第三、四、六镇统制和江北提督等职,声名显赫一时。当时,陈文远、杨善德、孟恩远、雷震春和李纯等北洋将领曾是他的部下,而徐树铮、曾毓隤等人则成为他的重要幕僚。

通过办学和带兵,段祺瑞的门生故吏遍天下,这就为他后来组

建自己的幕府并建立皖系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段祺瑞早年虽有知兵之名，但自加入北洋集团后却数年未派上用场。因此，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段时刻跃跃欲试。不久，在镇压农民和革命党人的几次战争中，段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段祺瑞随袁世凯赴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段率炮兵对义和团和民众狂轰滥炸，致使陵县、临邑、禹城等县许多村庄夷为平地，而他则因功升任山东督练公所总办。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段祺瑞奉命率领武卫右军剿办山东广宗、威县团民。他残酷杀害反帝农民1000多人，因功“赏戴花翎并加勇号”。

宣统二年（1910年）夏，段祺瑞复因奉命在长江以北各省镇压农民、会党反清起义有功，遂再次受到清政府嘉奖，并由江北提督升任署湖广总督。

就这样，段祺瑞这头性本善的“牛”，终于变成了一个吃人的“猛虎”。而改变段本性的，则是他所属的那个阶级和集团。

（二）三造共和的真相

“三造共和”是段祺瑞的政治资本，是他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法宝，故他常以此自诩。1920年7月8日，他在致总统徐世昌的呈文中就大言不惭地说：“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那么，“三造共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是让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答案吧！

段祺瑞所说的“一造共和”指的是1912年通电逼宫这件事。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全国震动。14日，清政府慌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第一军南下镇压，并令冯国璋率第二军随后跟进。但是，由于袁世凯背后捣鬼，北洋军又在前线消极怠工，致使星火反成燎原之势，南北各省纷纷宣告独立。

清政府束手无策，只好敦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几经讨价还价，清政府不得不再让步。10月27日，摄政王载沣下令召回 溥 昌，而以袁为钦差大臣主持前方军事。同时，改派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指挥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负责后方治安。11月7日，在袁的授意下，段派人枪杀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赶走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迅速镇压了滦州反清兵变，为袁将大本营驻扎在北京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国璋南下时，袁世凯密令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但冯为抢头功，却得寸进尺，不断进攻。北洋军11月1日攻占汉阳，21日攻占汉口后，冯复下令猛攻武昌，险些坏了袁的“一石二鸟”好事：即用清政府压革命派，用革命派吓清政府，迫使双方向他交权。16日，袁出任清政府内阁国务大臣，从皇帝手中夺取了军政大权。随后，袁将冯调回北京，改任段祺瑞为第一军总统兼湖广总督，准备实施用清政府压迫革命军妥协的既定方针。

段祺瑞对袁世凯的旨意心领神会。12月1日，他一到汉口，便下令北洋军停止进攻，并派徐树铮等人密赴武昌与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等人进行南北议和谈判。从12月1日至20日，经多次协商，双方达成以下五项议和条款：

- 一、清帝退位，确认共和政体；
- 二、优待清朝皇室；
- 三、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
- 四、优待南北出力将士；
- 五、组织临时议会。

南北议和后，段祺瑞奉命回军湖北孝感，伺机迫使清政府交权。其时，清廷王公大臣大多反对清帝退位，少壮派领袖良弼更是气焰嚣张。他组织宗社党与袁世凯争权，甚至企图建立战时内阁负隅顽抗。皇族垂死挣扎，袁、段一时难以下手。

1912年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良弼（次日不治而

死），皇族气焰顿消。当天，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联合 46 名北洋军将校，领衔发出请愿共和通电，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体制”，“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这就是说，清廷应将政权暂交袁代管。正当清政府犹豫未决之时，段在 2 月 8 日又领衔发来了措辞更为强硬的第二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列举皇族败坏大局等罪状后指出：清廷必须立即“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权而奠大局”，否则，他“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各亲贵剖陈利害”。其言下之意是，清帝若再不退位，他便要带兵入京问罪了。在此情况下，清帝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并于 12 日下诏退位。14 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准备向袁交权。于是，段遂赢得“一造共和”的美名。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谁推翻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又是谁缔造的？而段祺瑞一造的共和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政权？

历史不容篡改也无法篡改，答案十分明确：推翻清王朝和缔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都是孙中山和全国人民，而不是段祺瑞和北洋军阀。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十仆十起、武昌首义和全国各省响应，别说两封电报，就是 200 封电报，清政府也不会乖乖交出政权的。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袁记中华民国孰早孰迟的问题，相信一直压迫孙中山交权的北洋军阀们一定知之甚详。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的“袁记共和”是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们制造的。但是，这些赳赳武夫们制造的“共和”，既非一般意义上的共和体制，也非孙中山缔造的共和体制，而是一种特殊的共和体制，我们不妨称之为殖民化的共和体制。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对内镇压资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由此可见，“袁记共和”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是中国社会殖民化程度加深、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和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平心而论，较之封建君主专制，这种殖民化的共和体制毕竟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此，我们应予以肯定。

值得指出的是：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窃取胜利果实是苦涩的。自从共和制在中国大地上确立后，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民主代替独裁和法治代替人治，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谁违背这一历史趋势，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袁帝制自为是这样，张勋复辟帝制是这样，段借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也是这样。

段祺瑞说的“二造共和”，指的是他对袁世凯称帝拒不劝进这件事。

袁世凯窃国后，段祺瑞因功青云直上，先后担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和国务总理等职。在北洋团体中，段俨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当其时，段颇有袁氏百年之后，总统宝座舍我其谁的非分之想。

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一“候补总统”地位，段祺瑞使出了浑身解数，千方百计企图稳住袁世凯的总统宝座，他坐阵北京，镇压资产阶级“二次革命”；他率军南下，武装押送黎元洪入京以绝后患；他兼任河南督军，指挥 10 多万北洋军围剿白朗起义军。凡此一切，都为袁武力统一南北、建立独裁统治立下了赫赫战功。

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一“候补总统”地位，段祺瑞处心积虑地拼凑段记班子，以便伺机对袁世凯取而代之。首先，收买骨干，控制军队。段执掌陆军部后，往往擅自决定北洋军官的进退。段不仅提拔重用了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和曲同丰等人，拉拢了亲己的陈文运、张敬尧和贾德耀等人，而且排斥了亲袁的蒋方震、陈光远和陆锦等人，从而控制了北洋政府的军权。其次，另辟财路，力谋独立。段利用包买外国军火之机，授意徐树铮大肆收取回扣，初步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最后，安插内线，刺探机密。段在总统府军事处等要害部门暗中安排亲信，刺探北洋政府的各项核心机密，基本掌握了袁的各种动态。

1913 年 5 月 1 日 段祺瑞出任代理国务总理后 又将手伸向了政权。举凡对外借款、对内用兵等军国大事，他皆独断专行，不与国会商议。5 月 5 日 众议院对段向五国银行团借款一事提出质疑 要他出席国会答复。段届时竟率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会场，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阵势。大多数议员被他的淫威镇住不敢发问，几名不知高低的议员刚转弯抹角地质问了几句 便被段一口拒绝：“木已成舟 毋庸再议。”说罢 段对那些可怜巴巴的议员们连看都不看一眼 便带着武装士兵们扬长而去，大有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气概。

段祺瑞的声望隆隆日上，许多军政要员争相巴结。1914 年 3 月 6 日，段在北京筹办五十大寿时，府学胡同车水马龙，途为之塞。大庭将校满座，达官似云，极尽一时之盛。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正当段祺瑞即将爬上权力顶峰之时，不料却被袁世凯拉了下来。袁老奸巨滑，深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道理。他视北洋军为命根子，怎能甘心“军权旁落”而受制于人。镇压“二次革命”和白朗起义后，袁认为天下大定，便决定从段手中夺回军权。

5 月 8 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借以统一全国军权。他委任段祺瑞、刘冠群、陈宦、萨镇冰、王士珍和蔡锷等 6 人为办事员，规定办事员轮流在处值班，一切军政大事必须呈报总统定夺。这样一来，袁不仅收回了军权，而且将段降为与刘冠群等人平起平坐的办事员之一。袁将段挤到一边后，便放心大胆做他的“洪宪皇帝”美梦去了。从此，段祺瑞与袁世凯的矛盾日益激化。

自统率办事处成立后，陆军部逐渐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段祺瑞对此十分不满，便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进行抵制。他经常借故不去陆军部，而将部务交次长徐树铮代理。即使如此，袁仍不放心，企图以蔡锷或蒋方震对段取而代之，但因北洋派的反对未果。于是，袁便打算先撵走徐，斩断段的手臂。有一天，袁对段表示要

调动徐的职务，段立即拉下脸说：“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说罢，鼻子便歪到一边。段的这一公开示威，更使袁对他日益疏远。

1915年5月后，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并准备签订《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的支持。8日，袁召集国务卿及各部总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段祺瑞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抵抗，反对签约，致使会议不欢而散。随后，段又让陆军部向袁递交了一个要求增加职员薪金的呈文，继续与袁捣蛋。袁见段一再刁难，不由勃然大怒，批了“稍有人心，当不出此”八个大字断然拒绝。于是，段便借口“吐血失眠”愤然辞职，赴西山养病去了。

段祺瑞人虽在西山，但心却在朝廷。5月中旬，他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为借口通电全国，极力主张对日一战。袁知段醉翁之意不在酒，便苦笑着对段说：“芝泉老友，去则去耳，何必出此恶声！”31日，袁准段辞职，下令王士珍暂代陆军总长。段祺瑞见袁撕破了脸，也干脆破罐子破摔，公开打出“拒不劝进”的旗号。

段祺瑞为什么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他对亲信私下是这样讲的：“我当年曾发采取共和之电，如今又拥护项城登极，国人其谓我何？且恐二十四史中，亦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论公，我宁死也不参预；论私，从此只有退隐，绝不多发一言。”原来，段是怕成为历史罪人啊！

从此，段祺瑞闭门谢客，与他的亲信们一心构思“二造共和”的计划去了。

但是，袁世凯仍不肯放过段祺瑞和他的亲信。6月26日，袁以“订购外国军火浮报40万元”为借口，下令免去徐树铮陆军部次长职务，以田中玉继任。8月29日，袁又以“安心静养，以节勤劳”为名，下令解除段的陆军总长职务。随后，袁又下令将段囚于东四铁狮子胡同老陆军部，不许他过问军政大事。

段祺瑞被打入冷宫后，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竟乘机投石下井，企图将段置于死地。原来，小袁欲作太子继承大位，但又怕坏了他的好事，故准备派人暗杀段，以便除去这个潜在对手。段闻讯大惊，忙派夫人张氏出面进行“夫人外交”。张氏系袁夫人于氏的干女儿，常去袁府走动，充当袁、段双方的信使。于是，“枕边风”发挥了作用。一天，袁板起面孔教训大公子说：“你姐夫反对我是用口而不是用兵。由他去吧，你不要胡来！”这样一来，段总算保住了性命。其实，袁并非不想杀段，而是不敢下手罢了。因为当时冯国璋等许多北洋将领为了个人利益都不热心帝制，如果杀段，必将天下大乱。

袁世凯公然称帝后，很快便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之中。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护国讨袁，翌年1月10日，蔡率兵入川，全国震动，袁世凯敦请段祺瑞出任滇军总司令，段拒不遵命；帝制派寄匿名信恐吓，段公开表示“武人不怕死！”2月，段更公然提出“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的建议，段的这些言行，受到人们好评。

当时，许多人误以为段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甚至一些国民党人士，也称段是个“贤者”。大家对段属望甚切，希望他复出的呼声很高，直将他视为拯救共和的“救星”。这种错觉，就为段对袁取而代之创造了有利条件。

1916年3月22日，在护国战争的胜利进军和人民群众的一片反对声中，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皇帝虽做不成了，但他还想做总统。为此，袁决定重新起用段祺瑞，借以欺骗舆论，团结北洋派，重温总统梦。23日，袁任命段为统率办事处参谋总长。不久，又准备任命段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然而，袁对段是否真心保自己心中无底，故决定先试探一下再说。31日，袁约见段和国务卿徐世昌谈话。他装出一副极诚恳的样子对段说：“我老且病，悔不听汝言，故有今日。取消帝制，汝可相助为理乎？”其言下之意是，

如果我不当皇帝了，你能支持我当总统吗？谁知段却卖个关子：“当竭力相助，容与东海（指徐）熟计之。”段的弦外之音是，我虽愿意全力帮助你管理国家，但怎样个帮法，我还要和其他人认真讨论一下呢！

段祺瑞为什么要半推半就呢？原来，他打算效法袁世凯当年对清王朝逼宫的故伎，逼使袁交出军政大权并同意自己组织责任内阁，以便独揽北洋政府大权。几天后，段将自己与主要幕僚讨论的三项要求告诉了袁：第一，恢复元年约法；第二，组织责任内阁；第三，总统退位由副总统代理。这哪里是什么“要求”，简直就是最后通牒！但是，袁见过大世面，他比清廷孤儿寡母和皇族们更狡猾更顽固。他深知个中利害，故虽口头答应交权，但却迟迟不予兑现。于是，段遂与北洋将领和西南军阀密电往来，反对袁继续担任总统。

不久，西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将领也相继倒戈，反袁战线不断扩大。4月21日，徐世昌知难而退。22日，袁世凯只好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5月4日，政事堂奉命改称国务院，由段出面组织责任内阁。

然而，袁世凯决不许段祺瑞独揽北洋政府军政大权，即使临死前也是这样。6月初，袁病重不起，遂密召王士珍、冯国璋和段面授机宜。他对“北洋三杰”说：“我死后，诸君宜同心同德，永保勿替，勿为他派所乘。此后实行责任内阁，由芝泉（指段）为总理，实握政权。黎宋卿（黎元洪字）柔懦易与，可迎其就职为名义上之总统。”袁的这一滑稽表演，不由使人想起清咸丰帝临死前设立八大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往事。袁真不愧一代奸雄，临死还能想出一个死治段的绝招：内有黎制肘，外有王、冯制约，段虽“实握政权”，但要成为“袁世凯第二”却非易事，充其量不过为袁充当北洋派的“管家”罢了。

6日，袁世凯终于死去，中华民国宣告“活”来。段祺瑞躊躇

满志，准备粉墨登场。

由于护国军拥护黎元洪出任总统呼声甚高，而北洋派内部又意见不一，因此，段祺瑞决定将总统宝座暂时让黎，自己“实握政权”，推行另一种形式的个人独裁。黎继任大总统后，副总统由冯国璋接任，而段祺瑞则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至于王士珍，又一次见头不见尾了。自然，在这次权力再分配中，段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他不仅成为北洋军阀的头号人物，而且还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

这就是段祺瑞所谓的“再造共和”。

对此，人们不禁又发生了怀疑：段祺瑞并未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他闭门造车便能“再造共和”吗？对此，段是这样解释的。事后，他对侄儿段宏纲透露：袁称帝前，他曾五次劝阻，结果三次被拒绝，两次吃了闭门羹。他劝阻袁称帝的理由是“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不可做，万不能做”。袁称帝后，他未公开声讨，则是因为“我受老袁几十年知遇，如潜出声罪致讨，衡之旧道德，我不能这样做”。如此说来，段不仅反对袁氏称帝，而且还是恪守“旧道德”的模范，“再造共和”之人，真是非段莫属了。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罢了。事实上，段之所以反袁，是因为袁的做法不仅毁了自己而且毁了包括段在内的北洋集团。段之所以不愿公开反袁，则是因为他不想落个以下犯上、卖主求荣的罪名。由此可见，段袁之争并非君主专制与共和政体之争，而纯系个人权力之争。

那么，段祺瑞再造的这个“共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呢？它与袁世凯式的帝制又有什么区别呢？历史告诉我们：段的这个“共和”与袁的那个帝制相比，除了独裁者发生变化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段再造的这个“共和”，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政权，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共和”。

段祺瑞所说的“三造共和”，指的是他讨伐张勋复辟这件事。

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军政大权后，肆无忌惮地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又走上了对外卖国、对内独裁的老路。不同的是，段打的是“民国”旗号，且有“再造共和”这张护身符，故更具欺骗性。

但是，谎言毕竟掩盖不了事实。在事实面前，段祺瑞很快便原形毕露。袁世凯刚刚死去，段便挑起一场新旧《约法》之争。他公然反对南京临时政府 1912 年 3 月 11 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称旧《约法》），坚决主张维护北洋政府 1914 年 5 月 1 日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时称新《约法》）。6 月 6 日和 7 日，段在以国务院名义公布袁的遗令与黎元洪的任职时，均强调黎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系依据新《约法》的有关规定。这是因为，新《约法》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并将总统权力无限扩大适合段的胃口。在段看来，总统不妨先由黎暂代，然后再正式选举，而正式选出的新总统，自然非己莫属了。但是，段万万没有料到，此举竟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民党人士和西南军阀群斥段为“专制魔王”，坚决主张以旧《约法》为依据由黎继任总统，甚至北洋将领冯国璋、赵倜等人也大唱反调，主张恢复旧《约法》和旧国会。

在各方的强烈反对下，段祺瑞被迫暂时让步。6 月 29 日，段公布了恢复《临时约法》的命令，并宣布 8 月 1 日召集国会。他的如意算盘是：即使将总统制变为内阁制，让黎元洪当上傀儡总统，自己同样能以内阁总理的名义实行个人军事独裁，从而“武力统一”全国。

8 月 1 日，旧国会复会，依据旧《约法》，确认黎元洪为继任总统。接着，旧国会又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至此，各方政治目的均已暂时实现，南北也就暂时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

但是，段祺瑞需要的是事实上的军事独裁而不是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独裁与卖国似乎是个双胞胎。独裁必卖国，似乎只有卖国才能实现独裁。因此，为了实现这种军事独裁，段便不能不寻求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日本）的支持。事实上，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各国正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其中尤以日本最为活跃。袁死的当天，日本政府便急电驻华公使日置益，嘱其尽快晋见黎元洪，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日中亲善政策”。五天后，日本政府又急电日置益，让其立即拜会段祺瑞，转达上述对华政策。于是，在著名卖国贼曹汝霖的策动下，段决定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曹心目中的“善邻”，自然指的就是日本。日本政府对此颇为赞赏，决定全力支持段的军事独裁和“武力统一”政策。寺内内阁公开表示：“现今中国具有武力者方能统一中国，故决定援助合肥（指段）。”

有了日本这个靠山，段祺瑞的腰杆又硬了起来，他准备从黎元洪开刀，来个杀鸡给猴看。段素来看不起黎，认为他不过是个北洋后辈，是个从床下拉出来的民军都督，是自己武装押进北京的政治俘虏，只要稍一吓唬便会屈服。压服黎以后，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武力统一”，建立段记政府的目的。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却大错特错。黎元洪有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撑腰，又有国民党人、西南军阀和北洋将领冯国璋等人的支持，并非段想像的那么容易对付。

10 月后，段祺瑞与黎元洪在内阁人选、官吏任命和参战问题上明争暗斗，致使“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日趋激烈，最后终于在参战问题上公开摊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以梁启超、曹汝霖等人为说客，以金钱军械为诱饵，千方百计鼓动段祺瑞对德宣战，企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段认为德国虽强，但毕竟寡不敌众；中国若对德宣战，不仅可以改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得到金钱军械，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段权衡再三，决定

对德宣战。

1917年2月2日，段祺瑞内阁拟定了对德抗议、绝交和参战的三部曲，企图借此讨好日本，扩军备战，武力统一中国。然而，为了阻止日本独占中国，英、法、美却怂恿中国保持中立。在英、法、美各国和南方各省的支持下，黎元洪只同意对德抗议，坚决反对绝交和宣战。于是，围绕这一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结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文人黎竟战胜了武人段！

3月1日、3日和4日，段祺瑞一连三次率全体阁员赴总统府交涉对德绝交问题，均被黎元洪借故拒绝。

4月25日后，段祺瑞在京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外交问题，策动督军团威逼总统和国会同意对德宣战，又未收到多大效果。

5月10日，段祺瑞指使亲信靳云鹏、傅良佐等人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强迫议员必须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结果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正当段祺瑞出师不利、走投无路之际，北京英文《京报》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5月18日，该报无情揭露了段与日本签订《西原借款》，购买军械准备对南用兵的秘密，致使全国舆论哗然，内阁摇摇欲坠。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黎元洪决定“打虎”。5月23日，黎一连发布三项命令：一项是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以伍廷芳代理内阁总理；另一项是以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还有一项是任命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

段祺瑞无计可施，只好当天悻悻离京赴津。行前，他通电全国：“查共和国内阁制，非经在任内阁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上述三项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有趣的是，电报末尾署名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显然，他仍以现任总理自居，并不承认已被免职这一客观事实。其倔强执拗的性格和恋栈不去的神态，